

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 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

賴惠敏、張淑雅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提 要

過去學者探討乾隆皇帝贊助宗教活動，都注意到清朝皇帝利用宗教拉攏蒙古的關係。本文從內務府的檔案發現，乾隆皇帝跟著章嘉國師學習靜坐，早晚都做功課。皇帝如同藏傳佛教的教徒，捨地四百頃做為雍和宮經費來源，又溢注數十萬兩的銀子興修寺廟、造像，培植雍和宮的喇嘛學習誦經課程。

本文討論雍和宮與北京城市文化的關係，試圖說明藏傳佛教在北京的普及情況。雍和宮成為北京旗人的信仰中心，許多達官貴人爭相信奉藏傳佛教。有趣的是，漢人卻對藏傳佛教抱持負面的看法，與旗人虔心的態度截然不同。下層民眾則因藏傳佛教，將祭祀所用的香通稱為「藏香」，所有的蠟燭稱為「藏蠟」。其次，北京市民家家供奉家堂佛，請佛像後，舉行「裝藏」儀式，用麵捏成各種鮮果形狀稱為「麵供」，成為北京市民禮佛和祭祖的供品，此皆說明北京市民生活習俗逐漸受藏傳佛教影響。

關鍵詞：雍和宮、藏傳佛教、喇嘛、城市文化、北京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月3~5日）上宣讀。承蒙劉錚雲教授、蔡玫芬、馮明珠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本文引用的〈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為徐泓教授購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蒙徐老師慷慨借閱，特此致謝！

一、前言

過去學者探討乾隆皇帝贊助宗教活動，都注意到清朝皇帝利用宗教拉攏蒙古的關係。¹早在清人昭槤的《嘯亭雜錄》提及：「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仗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王制所謂『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²德勒格《內蒙古藏傳佛教史》也認為乾隆皇帝御筆書寫幾百函經卷，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大藏直經》，以及印製蒙文和滿文的《甘珠爾經》、《丹珠爾經》，都是為其政治目的服務，此因乾隆皇帝在御製《喇嘛說》裡提到：「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襲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³言下之意，清朝為了懷柔蒙古王公，而保護其信仰。金梁編纂《雍和宮志略》提到乾隆皇帝的信仰，他說：「一般的傳說，都說是弘曆已從十五【三】世章嘉受戒，欲藉宗教力量超渡他父親。這話是沒有證據的無稽之談，並且不了解弘曆是一個最沒有宗教信仰的人。」⁴

由於《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被翻譯成漢文後，乾隆信奉藏傳佛教被公諸於世。⁵乾隆皇帝是位虔誠教徒，在北京和承德修建許多喇嘛寺廟，而且因內務府的檔案公布後，得以瞭解皇帝花費在藏傳佛教的經費特別多。⁶乾隆皇帝把父親的府邸改建為雍和宮，無法改變宮殿的外觀，只在屋宇上裝了方樓和寶塔。做為喇嘛寺廟的雍和宮也不全然是寺廟，還存放著王府時代遺留的寶物和乾隆皇帝幼時的玩具，乾隆皇帝到此靜坐或聽章嘉國師講經，或聽戲等，看起來像家廟的性質。

1 如趙雲田討論章嘉國師幫助清政府平息了青滾雜卜企圖謀求和西蒙的聯合獨立，有利於清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的重大意義。參見氏著，《章嘉和清朝的藏傳佛教政策》，頁34-45。

2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10，頁361。

3 德勒格，《內蒙古喇嘛教史》，頁155。

4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15。

5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186-187。朵藏加探討藏傳佛教密宗也特別引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探討乾隆皇帝修習藏密的過程，參見朵藏加，《藏傳佛教密宗與北京雍和宮》，頁93-96。

6 乾隆年間北京修建和額設喇嘛的藏傳佛教寺廟，共有33座：三佛寺、三寶寺（新寺）、大正覺寺、大隆善護國寺、化成寺、功德寺、弘仁寺、永慕寺、同福寺、西黃寺（清靜化城）、妙應寺、東黃寺（普靜禪寺）、長泰寺、後黃寺、梵香寺、淨住寺、普度寺、普勝寺、隆福寺、嵩祝寺、慈佑寺、慈度寺、新正覺寺、聖化寺、資福院、達賴喇嘛廟（彙宗梵宇）、雍和宮、嘛哈噶啦寺、察罕喇嘛廟、福佑寺、慧照寺、寶諦寺、闡福寺。參見（清）松森等撰，《喇嘛事例》，收入《欽定理藩部則例》，卷56，頁1-17。

雍和宮建於康熙33年（1694），原為雍正即位前的府邸。雍正3年（1725）改為行宮，乾隆9年（1744）改建為喇嘛廟。雍和宮屬於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南北長400公尺，總面積為6.6萬平方公尺。雍和宮的建築包括三座精緻牌坊和雍和門、雍和宮殿、永佑殿、法輪殿、萬福閣等五進宏偉大殿組成。另還有東西配殿、四學殿和戒台樓、班禪樓。雍和宮初建時已有五進的規模，然而要成為藏傳佛教的寺院，需做局部修改。《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提及雍和宮的建築宏大壯麗，各扎倉有經堂、上師府邸、僧舍等大小房屋，一應俱全。各佛殿內供有無數的經、像、塔和各種供器，使人目不暇給。各殿堂和喇嘛僧舍中日用、僧人給養由府庫撥經費。⁷ 乾隆皇帝改建雍和宮以及供養喇嘛僧侶，花費不少銀兩。本文的第一節將討論乾隆年間改建雍和宮的過程，特別是新增將近一千間僧侶的居住場所，以及修建放置26公尺高的白檀木大佛像的萬福閣等。

又，雍和宮各殿供奉許多佛像，還陳列大量珍貴文物，其中紫檀木雕刻的五百羅漢山；金絲楠木的精雕佛龕；白檀木大佛被稱為雍和宮的三絕，最重要的是白檀木大佛雕刻。除此，成做佛像需使用各種金、銀、銅、鐵、錫等金屬，以及佛像裝藏使用多達千、萬兩銀，為曠世絕代的作品。尤其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經》出版，內務府成做大量佛像。⁸ 佛像按照量度規定和既定的圖像模式塑造，可以看出乾隆時代物質文化之發達。

其次，乾隆皇帝在北京建立雍和宮作為喇嘛講修佛法的「扎倉」，這是清歷代皇帝前所未有的壯舉。皇帝欽派章嘉國師掌管京城喇嘛事務，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為將雍和宮變成培養蒙古等地的喇嘛之場所，設四學殿——講經殿、密宗殿、數學殿、藥師殿。在北京大力培植喇嘛學生，人數近千人。喇嘛除了學習經典課程外，並花費很多時間在節慶上的誦經活動。特別從據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以下簡稱〈月摺檔〉）等檔案，看到乾隆皇帝在歷代祖先誕辰及他個人生日的誦經法會，證明他信奉藏傳佛教之虔誠。

為了供應經費，乾隆帝將雍親王府所屬直隸27個州縣的400餘頃地，作為雍和宮的香燈地。此外，〈月摺檔〉記載喇嘛每月誦經念佛菜錢，還有各項賞賜等。本文第三節將討論乾隆皇帝編列雍和宮日用的經費，以及喇嘛各種宗教活動

7 土觀·落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137。

8 （清）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經》。

等。蔡玫芬在〈皇權與佛法：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研究〉一文中認為，乾隆皇帝在「喇嘛說」闡明其贊助藏傳佛教乃為政治上的安撫蒙藏邊藩，而非佞佛，其目的似為其耗費大量國帑以興築寺廟、奢華其陳設找尋藉口；以中原史觀自我辯護，掩飾其宗教上修習密法與慷慨佈施的行為。⁹ 本文即以皇帝修建雍和宮和其他各項經費支出，佐證蔡教授的觀點。

最後一節將討論雍和宮與北京城市文化。雍和宮成為北京旗人的信仰中心，許多達官貴人爭相信奉藏傳佛教。有趣的是，漢人卻對藏傳佛教抱持負面的看法，與旗人虔心的態度截然不同。至於北京庶民在禮佛時使用藏香、佛像裝藏和製作麵供。由此可見，以雍和宮為主的藏傳佛教對北京城市文化影響。

過去，研究唐代史的學者提到武則天崇佛、唐中宗和睿宗重佛，大肆度僧造寺，糜費錢財，府庫為之虛耗。本文仔細的計算乾隆皇帝在宗教的支出，讓人瞭解他重佛的程度也不下於唐代的帝王們。根據Harold Kahn（康無為）的研究，乾隆時代花費七千多萬兩銀在重建與增築紫禁城上。國庫的支出代表「宏偉氣象」之政治經濟學的另一面¹⁰ 正確的來說，七千萬兩銀的支出中，修建紫禁城內的寺廟及宗教活動的經費，所占比例遠多於修紫禁城。關於乾隆皇帝的宗教消費問題將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二、雍和宮的修建

雍正皇帝去世後，棺柩在乾清宮停棺19天，9月11日移停在雍和宮。當初，雍和宮為親王府邸時按體制使用綠色琉璃瓦，乾隆元年把雍和宮的昭泰門、雍和門、雍和宮正殿、永佑殿、法輪殿等處，改換黃色的琉璃瓦，雍正帝的棺柩放在永佑殿內。乾隆元年8月17日，海望奏，今將中殿、後殿改黃瓦，殿內應行添建楠木神龕、供案等。辦買木植磚灰繩斤顏料工價等項，約估銀4,987兩。¹¹ 乾隆皇帝將他父親的影像供在永佑殿內，名為神御殿。故添建楠木神龕、供案等。每天都有喇嘛在雍和宮正殿和後殿（即法輪殿）誦經。

⁹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研究〉，收入《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頁1-59。

¹⁰ Harold Kahn（康無為），〈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收入《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頁64。

¹¹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195冊，乾隆元年8月17日。

乾隆9年（1744）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廟，成立了「雍和宮工程處」負責修建工程及辦買物料。雍和宮原是中國式的宮殿，爲了符合西藏寺廟的樣子，仿照故宮的雨花閣，在殿脊上建重簷的方樓，方樓上又安設舍利寶塔，寶塔樣子屬西藏式，方樓則是中國式。此項繕修費用由內務府銀庫支出，根據〈月摺檔〉記載，13年7月先領過銀3萬兩，12月又領銀2萬兩，共5萬兩。¹² 雍和宮的主要建築形式維持宮殿的輪廓，而窗門殿飾則用唐古忒式。

乾隆皇帝派三世章嘉呼圖克圖爲管理京師寺廟喇嘛扎薩克，給銀印一顆，呼圖克圖（hutuketu）或稱胡圖克圖，即活佛或佛爺之意。章嘉活佛自九歲到北京和乾隆皇帝一起讀書，兩人感情親密。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中提到，乾隆10年，皇帝修習藏密，向章嘉國師說：「朕欲學習密法，請給我傳授入乘法灌頂，還要把你的本尊神勝樂灌頂法傳授給我。」章嘉爲他舉行隆重的灌頂儀式，給乾隆皇帝傳授全部的「勝樂鈴五神」灌頂法。灌頂時，皇帝請章嘉國師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己坐在較低的座墊上，一直跪到灌頂結束。皇帝給章嘉國師奉獻了一具鑲滿奇珍異寶的金質曼扎，並布施財物無算。乾隆皇帝又依次聽受「吉祥輪勝樂深奧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等密法，堅持每天上午修證道次，下午修證勝樂二次第。每月初十日舉行壇城修供、自入壇城、會供輪、供養等活動。¹³ 皇帝學習佛法，跪在地上，頂禮章嘉國師的腳。如此尊寵，令人難以想像。

乾隆15年（1750）西藏七世達賴感謝皇帝派兵平定西藏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勒的叛變，竭力在西藏蒐羅古物和佛像。當時，廓爾喀國王（尼泊爾）從印度運來一棵白檀樹，七世達賴用大量的珠寶，把白檀樹換來，從西藏運到北京。由養心殿造辦處的廣木作、木作、漆作、雕塑作、如意館五處的工匠，會同中正殿辦造佛像的喇嘛工匠，在察漢達爾罕喇嘛設計指導下，成做爲5.5丈的大佛像。爲了安置大佛像，拆去觀音殿，改建萬福閣。大佛像全身貼滿金葉，而且鑲嵌珠寶，頭上戴著金色五佛冠。¹⁴ 此外，連成造鑄胎漆金邁達里佛等，所有辦買木石磚灰

12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11冊，乾隆9年4月17日；〈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13年7、12月。「該年一共建造塔1座、塔圍5層、重簷方龍亭1座、方棕亭1座、重簷碑亭1座、有城平臺1座、塔座1個、重簷方亭1座、四廈三簷方亭1座、捲棚亭1座、牌樓1座、前捲後墊重簷方戲亭1座、方亭1座、八角蓮花高臺1座、八角座子1個、無頂方亭2座、鐵輪大小13個，又戲臺1座、宮戲臺1座。」

13 土觀·落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183。

14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283-285。

繩麻釘鐵襍料及給發各作匠夫工價、運價按例銷算銀86,038.54兩、赤金315.07兩。¹⁵該年，雍和宮萬福閣前添建東西配樓2座，並西邊修建廟宇成砌墻垣修理暗溝等項工程，實用銀16,937.36兩。又續添粘修東書院等處殿宇房間頭亭，並修理吉隆胡圖克圖居住正房廂房，後樓圍房添安板壁，挪安地罩，拆搭地炕祭器處，正房挑換椽望，順山圖房添砌院墻等項。¹⁶

乾隆17年，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准，粘修雍和宮殿宇、僧房，併東書院殿宇房間辦買物料、匠夫工價，共領銀3,667.64兩。¹⁷僧房又稱為「連房」就是喇嘛的宿舍，在昭泰門的東邊，分東、中、西三路，每路10連共30連。根據金梁的研究，乾隆皇帝修建雍和宮時，把雍親王府南邊太保街一帶的民房，用官價收買而改建的。¹⁸

雍和宮雖改為喇嘛寺廟，但雍和宮的後樓和東書院兩區還保留雍正皇帝時代的器物。乾隆皇帝誕生於雍和宮東書院內的如意室，東書院內陳設雍親王府時代的古玩器物。清朝皇帝在五月夏至節祭北郊的地壇後，必到東書院大和齋內吃芝麻拌麵。東書院有「大塊文章台」是雍親王府內演戲用的戲臺，北面的「五福堂」為府內眷屬聽戲用的看臺。雍和宮後樓即第六進的綏成樓，緊接著綏成樓的東山牆叫「東順山樓」；西山牆叫「西順山樓」，綏成樓內收藏著不少乾隆皇帝幼時用的玩具。¹⁹乾隆27年的修建工程主要針對這些建築，雍和宮東書殿宇、房座、遊廊、並後佛樓房間，以及雍和宮廟宇、鐘鼓樓、戲臺、旗杆、柵欄等項。此項工程記載雍和宮的佛殿僧房數量：廟宇方座共49座計214間；僧房130座計919間；東書院殿宇房座，共78座計326間內；正座宮殿23座計112間；遊廊值房共55座計214間；後佛樓殿宇房座共9座計47間；西邊關帝廟殿宇，共7座計21

15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21冊，乾隆15年1月21日。「二十一日，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修建雍和宮萬福閣1座、永康閣1座、延寧閣1座、飛仙遊廊2座、折蓋綏成樓1座、順山樓2座、西轉角樓1座、太歲壇1座、西邊接蓋僧房2間、看守房14間。成砌墻垣27.56丈鋪墁丹陛甬路、海墁散水、油畫糊裱。」

16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21冊，乾隆15年2月21日。「萬福閣前添建配樓2座、穿堂3間、垂花門1座、成砌院墻22.5丈，並西邊修建廟宇內山門1座、山門3間、大殿3間、前簷接蓋抱廈1間、配殿2座、後殿5間、順山房2座。成砌墻垣124丈，隨開門口15座柵欄，修理暗溝143.4丈。挪蓋諸旗房2座，及鋪墁地面甬路、海墁散水、油畫糊裱。」

17 (清)乾隆朝〈內務府銀庫進項月摺檔〉，乾隆17年4、7月。

18 金梁在書中提到清末僧房和各佛倉的房屋共有643間的灰房和瓦房，及12間遊廊的巨大數目，可以說是北京城內首屈一指的大喇嘛廟。參見氏著，《雍和宮志略》，頁163-164。

19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180-181；186-187；189。

間。以上粘修佛殿僧房共1,157間，共約需銀16,619.5兩。²⁰ 31年又修理東書院、後佛樓等殿宇房屋，買辦物料和匠役工價用銀15,223.53兩。²¹

乾隆44年（1779）年六世班禪羅桑貝丹益西為慶賀乾隆70歲，特地從扎什倫布寺大壽啓程至京，次年9月到北京。²² 乾隆命人修繕雍和宮的班禪樓、戒台樓及法輪殿，做為班禪蒞臨雍和宮禮佛時的休息和講經場所。六世班禪和章嘉國師一同在雍和宮戒台樓給皇帝講解「迅捷智慧六臂依怙隨許法」，由章嘉國師譯成蒙語，講給皇帝聽。²³ 該年11月六世班禪因患痘，圓寂於西黃寺。乾隆命造辦處成做六世班禪大師銀像，供奉於雍和宮班禪樓內。法輪殿的右邊為戒台樓，傳說乾隆皇帝常穿上喇嘛的朝衣，披著大紅綢的哈達，戴著金質五佛冠，或桃形黃帽，坐在壇台上靜坐參禪，或講經說法。眾喇嘛圍在他的左右前後，焚香頂禮的聽他講經，故此樓叫「戒台樓」。²⁴

乾隆44年修繕雍和宮，8月將雍和宮所有佛號俱添蒙古字書寫四樣字，又修法輪殿西邊添建重簷戒台一所，以及拆卸舊有戒台殿三間木戒臺一座。除揀選舊料抵銀4,578.23兩，顏料紙張等項各處取用，官廠木植值銀3,874.02兩，其餘辦買石料磚瓦、工價等估銀8,894.17兩。²⁵ 乾隆47年，郎中連城文開奏准雍和宮、法

²⁰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62冊，乾隆27年10月9日。

該工程所用銀兩如下：1.木植銀1,582.6兩，2.石料銀70.08兩，3.磚瓦銀728.6兩，4.琉璃瓦料銀432.3兩，5.灰斤銀2,692.7兩，6.繩料銀122.9兩，7.雜料銀663.2兩，8.大木作工價銀258兩，9.南木作工價銀192.2兩，10.石作工價銀65.2兩，11.瓦作工價銀2,409.6兩，12.搭材作工價銀327兩，13.土作工價銀72.4兩，14.錫作工料銀8.7兩，15.油畫工料銀5,391兩，16.裱糊工料銀202.9兩，17.出運渣土拉運物料銀538.3兩。共約需銀16,619.5兩。

²¹ （清）乾隆朝〈內務府銀庫進項月摺檔〉，乾隆31年正月。「雍和宮、法輪殿、塔樓築師壇、戒壇、圍房、朝房並院遊廊、淨房、殿宇、僧房、添砌院牆等項工程，原估物料工價銀15,919.25兩，經工自行核減銀145.72兩，實淨銷銀15,223.53兩。今率領郎中珠爾杭阿伊靈阿、員外郎仲山額爾登布覆加詳細查核，該工所用一切物料工價均屬相符。」（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89冊，乾隆32年11月16日。

²² 月摺檔記載，7月筵宴班禪額爾德尼賞銀10,000兩、喇嘛15名，每名賞銀150兩、小喇嘛1名賞銀50兩，共12,300兩。還有班禪圓寂前後亦曾賞賜共約6,000兩。9月班禪額爾德尼前往昭廟開光各寺廟拜佛跟隨胡圖克圖喇嘛等往還，共用車630餘輛，預領車腳大制錢200,000文。班禪額爾德尼喇嘛等由熱河至京居住黃寺等處，備用乳牛、羊隻餵養辦買草豆等物，領銀2,533.65兩。參見〈內務府用項月摺檔〉，乾隆45年7-10月。

²³ 土觀·落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350。

²⁴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176-177。

²⁵ 照戶部揀准用銀七錢三之例，領銀支6,225.92兩，大制錢2,410,425文。（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356冊，乾隆44年8月25日。〈內務府用項月摺檔〉記載，乾隆44年9月此項工程共用銀10,099.94兩。

輪殿、西邊戒臺殿改建重簷戒臺殿一座，又改建藥師殿等項工程，原估工料銀23,172.03兩，除領過銀兩外找領不敷銀948.95兩。²⁶員外郎連城文開奏准改建雍和宮、法輪殿、東邊藥師壇、照西邊戒臺殿樣式、上簷、添週圍廊、內簷裝修等工，共領銀8,286.8兩，內有木植銀4,751.93兩，照例由該工交納圓明園銀庫歸款。

乾隆52年修理雍和宮正面牌樓、天王殿前旗杆、昭泰門外牌樓等工程，取用官廠木植值銀667兩，工料銀5,741.45兩。²⁷乾隆53年住持喇嘛扎克巴丹達爾等報，雍和宮僧眾居住房間，以及廟內圍房看守房堆撥房共計954間，自乾隆38年粘修以後逾16年，尚可居住280間，其餘674間糟壞不全、墻垣坍塌，應行修整。計昭泰門外西邊圍房56間，僧房40間，東邊圍房81間、僧房250間、東花園僧房82間、印上僧房14間，後井僧房37間，小廟僧房27間、辦齋房5間、西阿斯哈門北夾道僧房53間、關帝殿6間、堆撥房18間，以上共房82座，計674間。應行拆瓦房585間，拆砌院墻699.7尺。粘修門樓32座、門口99座，並各座外簷油飭內裡表湖成搭棚座圈廠等項用取官廠木植6,737.59兩，淨估需銀22,072.14兩。²⁸

乾隆55年粘修殿宇僧房共69間，包括雍和宮萬福閣1座計7間、永康間1座、延寧閣1座、飛仙遊廊2座，並永佑殿兩山穿堂2座計12間，並安定門外下院小廟大殿3間、東西配殿6間、後殿5間、僧房5間等。所有估需銀兩奏請在廣儲司銀庫現存雍和宮香燈餘存銀兩內照數支領。共約估銀24,364.34兩。²⁹

雍和宮目前仍是北京規模最宏偉的藏傳寺廟，這是乾隆皇帝大力挹注經費修建的成果。相較之下，康熙時代修建五台山的寺廟，不過發內帑一千、三千兩，經費極少，其寺廟規模和金碧輝煌的氣象，絕對比不上雍和宮。

三、成做佛像

藏傳佛教重視造像藝術，在清宮藏有許多各種材質的佛造像。雍和宮的佛像已有許多學者寫過介紹。³⁰康熙36年（1697）在宮廷設「中正殿念經處」負責供

26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47年4月。

27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401冊，乾隆52年1-2月。

28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412冊，乾隆53年12月26日。

29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419冊，乾隆55年2月3日。

30 雍和宮佛像寶典編委會編，《雍和宮秘藏》、《雍和宮佛像寶典》、《雍和宮唐喀瑰寶》（上、下）、《雍和宮建築藝術》、《雍和宮織繡精品》、《雍和宮法物法器大全》。

中藏傳佛教事務，並兼辦造佛像。故，〈月摺檔〉提到雍和宮造佛像的部分不多。第一次是乾隆11年成做三世佛像，高營造尺5尺，雍和宮正殿正中的銅佛像為釋迦牟尼佛，就是三世佛中的「現在佛」，左邊燃燈佛是過去前世佛，又叫「定光佛」。右邊的銅像叫「彌勒佛」，又叫「邁達拉佛」，即三世佛中的「未來佛」。按造銅佛像之例，每高一尺用工料銀139.6兩銀，佛像所用鍍金葉為足色赤金，亦稱「飛金」，其裝顏佛像並成做背光共器龕案應用飛金260兩。康無為認為乾隆皇帝的收藏品都是光彩奪目之作，多半且是無上珍品。³¹ 為了達到「光彩奪目」的帝王品味，乾隆特別要求內務府成造雍和宮佛像都按照《造像量度經》的規定，此經是由工布查布翻譯。乾隆時宮廷造像規模盛大，活動頻繁，參與工匠眾多，製作的佛像成千上萬。不過黃春和的批評是，佛像按照量度規定和既定的圖像模式塑造，走向程式化，乾隆造像生硬呆板，匠氣十足，導致藝術水平急遽下降。其藝術水平遠不如康熙年代。³²

藏傳佛教的佛像裝臟，象徵佛的身語意。裝臟圓滿之後，再如法開光，請佛安住。雍和宮的佛像以金、銀、琉璃、水晶、瑪瑙、玻璃等來象徵舍利。裝臟在藏傳佛教中是重要的儀軌之一，乾隆皇帝信仰引進西藏的佛教文化，甚至影響到北京市民供奉「家堂佛」時，也有裝臟儀式。關於這問題，擬於第五節詳敘。佛像的胸腔和腹腔裝各種寶藏稱「裝臟」，譬如現存明代不動佛像（Acala）的身上裝紅、黃、綠綢緞條，代表心臟、肺、腸等。蓮座內裝大小禱詞、咒語、經卷、香料和代表五穀的這種乾果。³³ 《造像量度經》記載，裝臟還需用梵文或藏文的經咒。另有五寶：蜂蜜、石蜜、乳、酪、酥油。五樂：菖蒲、仙人掌、苦參、烏賊、藤梨簕。五穀：稻、大麥、小麥、綠豆、白芝麻。五香：白檀、沈香、肉豆蔻、龍腦香、鬱金香。³⁴ 從〈月摺檔〉可以看到乾隆年間三世佛像中的裝臟也包括各種珍寶，裝臟取六成色淡金、銀、小珍珠各0.02兩；九分重金鏤27箇，用六

³¹ Harold Kahn (康無為)，〈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頁67。

³² 黃春和，〈元明清北京宮廷的藏傳佛教：造像藝術風格及特徵〉，頁31-36。

³³ 乾隆9年三和奏，雍和宮成做背光、供器、龕案、寶塔約估應用飛金需赤金260兩，向廣儲司支領。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11冊，乾隆9年4月12日；故宮博物院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頁74、214。

³⁴ (清)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經》，頁49。活計檔中記載章嘉國師指導裝臟的內容：「裝臟擬安主心木一根，上安共楠木藏斗一件，藏斗內應裝供五大吉祥、四大根本等咒，並白檀香紫檀等五種，草果豆蔻等藥六味。」，參見《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137盒，乾隆44年8月記事錄。

成色淡金2.43兩；十兩重銀盤3箇、五兩重碗3箇、六錢重匙3張、九分重銀廿七箇用銀49.27兩。此外，乾隆皇帝在雍和宮的三世佛蓮座裝藏用小盃甲3副、大小鐵78塊、釘4,194箇、腰刀3口、大小鐵27塊、取象3副、大小鐵102塊、鍍金取頭等赤金葉，共2.43兩。三世佛蓮座裝藏用小盃甲3副、鐵式件3塊、撒袋3副、大小鐵式件12塊、鍍銀取銀葉共0.07兩。³⁵ 佛像裝藏放置武器，或許與乾隆皇帝尚武精神有關。章嘉國師的傳記中提到乾隆20年（1755）准噶爾汗王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不和，皇帝準備發兵征討，章嘉國師、噶勒丹錫埒圖、濟隆活佛等廣做法事。三位上師舉行了吉祥大威德金剛威猛燒施法事。不久，達瓦齊被擒獲，准噶爾和回回部都歸於大皇帝的統治下。乾隆32年（1767）皇帝用兵征討雲南門域和麗江等地，國師奉旨在永安寺做七天的「色界大自在吉祥驅敵天女威猛施食」法事，在法事中拋擲食子，敵方的軍隊突然轉身而逃，自相踐踏，損傷慘重。³⁶

乾隆14年工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奏准雍和宮成造佛33尊，併做五塔龕等項取銀20,000兩、頭等赤金300兩。供佛裝藏取九分重六成色淡金鏤9箇、六成色淡金0.3兩共六成色淡金1.11兩、小珍珠0.39兩、重0.03兩銀鏤1箇、重4.13兩銀盒1箇，共銀4.13兩、紅寶石0.03兩。³⁷ 金銀、珍珠用途也為裝藏之用。乾隆15年（1750）雕刻彌勒佛站像，全身貼金，頭戴五佛寶冠，身戴瓔珞手鐲，金釧都嵌有松石、珠翠等。此大佛像蒙古語叫「邁達拉」。〈內務府奏銷檔〉記載佛像和萬福閣等工程，所用經費超過八萬兩。製作過程包括鑄胎漆金邁達里佛1尊，開花見佛寶龕1座，鑄胎佛像44尊，香水蓮池1座，轉輪藏塔1座，鑄胎佛像28尊，抗神8尊，並殿內鑄胎佛像30尊，須彌佛座104分，蓮座25分，背光41扇，鑄胎龍王1尊，海神1尊，懸山1座，供櫃12座，雕龍供案1張，素線供案2張，楠木供桌13張，掛龕20座，畫廊板牆28.36丈，雕龍匾1面，素線匾2面，楠木香几10座，磬几1座，五供1分，靈芝1對，把蓮1對，配做供果98個。俱油漆彩畫裝顏掃金，並裝慶佛藏等項工程。³⁸ 佛像的全身漆金，頭上戴著金色的五佛冠鑲嵌珠寶，卻

35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10年5月；11年5-6月。

36 土觀·落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227；322-323。

37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14年4-7月。

38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21冊，乾隆15年2月21日。「二十一日，奴才海望三和德保額爾登額謹奏。為奏聞銷算用過銀兩數目事。奴才等遵旨修建雍和宮萬福閣一座，永康閣一座，延寧閣一座，飛仙游廊二座，折蓋綏成樓一座，順山樓二座，西轉角樓一座，太歲壇一座，西邊接蓋僧房二間，看守房十四間。成砌牆垣二十七丈五尺六寸。鋪墁丹陛，甬路海墁散水，油畫糊裱。」

是方面濃眉，凸目巨口。據說這佛像的設計兼指導是察漢達爾罕喇嘛，他不懂藝術原理，以致把這稀世珍品的整棵大檀樹，刻成既不是密宗，也不是顯宗。北京人常說：「不文不武的四不像子」。³⁹ 根據黃春和的看法，白檀木大佛由蒙古喇嘛察罕活佛主持雕刻，蒙古造像風格並沒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北京的流行中也融入宮廷造像藝術因素。清代宮廷造像始終是北京藏式造像的主流風格。⁴⁰

製作大佛之後，須製作其他佛像、供案、供器等項。因此，又成造鑄胎菩薩3尊，身各高2.06尺，使油灰糊布糙漆墊光漆使漆篩掃紅。金獅象吼，使油灰糊布墊光漆滿放水金上五彩裝顏，松椴木雕做蓮座3座、獸座3座，使油灰麻布光硃紅漆，雕花處戳掃紅金增胎。韋馱天王2尊，法身各高6.6尺，立胎骨木上糙泥細泥粘做鑽生油，使油灰糊布滿放水金上五彩裝顏，成做松木供案5張，椴木八吉祥3分，青白石須彌座3分，以及舊有伏魔大帝1尊，從神4尊，粘補襯泥使油灰糊布墊光漆滿放水金上五彩裝顏。又清淨地呀們達噶佛1尊移請在西配樓上明間供奉，添做供案1張、供櫃1座、八吉祥1分。⁴¹ 紫麻脫沙像又名夾紵像，先在木骨架外用泥土塑模，經數十道纏紗布、塗漆、細部捏塑的過程。泥胎外形成了較厚的漆布層。乾透後，將泥土從底部掏出，再施金彩畫。⁴²

同年，在天王殿泥塑彩繪的韋馱天王2尊，法身各高6.6尺，立胎骨木上，糙泥細泥粘做鑽生油，使油灰糊布滿放水金上五彩裝顏。韋馱天王像是泥塑，作法由內部施以木骨架，並纏繞麻繩，外面由粗至細層層敷泥，再行彩繪。另外成做松木供案5張，椴木八吉祥3分，青白石須彌座3分。舊有伏魔大帝1尊，從神4尊，粘補襯泥使油灰糊布鑽生油滿放水金上五彩裝顏。又尊旨清淨地呀們達噶佛1尊，移請在西配樓上明間供奉，添做供案1張，供櫃1座，八吉祥1分，以上所需工料等項詳細約估除銀硃、苧布向該處行取應用外，所有辦買物料及給發各作匠夫工價，通共約銀1,289.9兩，請向廣儲司支領應用。⁴³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恭造擦擦無量壽佛1,800尊，辦買物料併給匠役等工價領銀118.94兩。

39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286-287。

40 黃春和，〈元明清北京宮廷的藏傳佛教造像藝術風格及特徵〉，頁31-36。

41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22冊，乾隆15年6月19日。12月13日完工，共用銷算過銀21,314.9兩，舊料值銀3,513.65兩，四達子買木植值銀842.15兩，同上，第223冊，乾隆15年12月13日。

42 雍和宮佛像寶典編委會，《雍和宮佛像寶典》，頁125。

43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22冊，乾隆15年6月19日。

佛陀所坐的臺座稱為「須彌佛座」，五供包括香爐1個、燭臺1對、花瓶1對。佛像前面掛著一丈餘長的繡幡和繡帘，總稱為「佛前幡帘」。八吉祥又稱八寶，是佛家常用的象徵吉祥的八件器物，指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罐、金魚、盤長。柯嘉豪指出佛教經典《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說佛是少欲知足的苦行僧，但也說他說法時周圍都是極寶貴的物品。對一般人而言，物品是用來提高社會地位或創造莊嚴高貴等氣氛的好工具。⁴⁴ 在雍和宮的佛像皆以金雕玉砌來呈現佛像之莊嚴具足，及展現皇帝做「功德」之用心。

乾隆44年六世班禪到北京，替乾隆皇帝受戒，雍和宮現存乾隆受戒時所用的一套器具和一幅寫實的《乾隆受戒圖》。⁴⁵ 45年11月六世班禪圓寂於西黃寺，乾隆皇帝命塑寶像奉於雍和宮班禪樓。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之金塔通高7.76尺，下座見方5尺，共用過四成金7,033兩，頭等鍍金葉120.02兩，並買辦物料外僱匠工價銀2,926.41兩。繪畫班禪額爾德尼像五軸，配畫無量壽佛像二軸，共合見方尺41.88尺，共應領顏料銀23.72兩，外僱畫匠38名用工價11.7兩。六世班禪像頭戴桃形貌，身穿法衣，面部慈祥，右手當胸作說法印。51年章嘉國師去世，乾隆皇帝悼念他，撥了大批銀兩，熬茶誦經，還製造鑲金銀像，供奉於鎮海寺。並於前藏施銀一千兩。後藏施銀五百兩，為熬茶誦經費用。製作國師金塔比照六世班禪成例，用四成金七千餘兩，頭等鍍金葉120.02兩，並買辦物料外僱匠工價銀2,926.41兩。皇帝又命造辦處成做章嘉國師銀間鍍金像，辦買金青顏料等物領銀每幅3.97兩，共製作6幅金像。⁴⁶

章嘉國師對清朝的貢獻在於乾隆皇帝利用他平亂，乾隆15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咸挺而為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乾隆21年喀爾喀和托輝特部郡王青滾雜卜叛變，章嘉國師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同喀爾喀各王公會盟，孤立青滾雜卜，並令超勇親王額駙策凌之子成袞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討伐叛亂。青滾雜卜轉求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代奏，請求寬宥。乾隆不肯，嚴令成袞扎布擒拿。青滾雜卜逃到中俄邊界杭哈獎噶

44 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少欲知足”、“一切皆空”及“莊嚴具足”：中國佛教的物質觀〉，收入胡素馨主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5-47。

45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頁192。

46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146盒，乾隆51年5月記事錄；〈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51年5；7；閏7；10月。

斯地方，11月被擒拿歸案。⁴⁷ 青滾雜卜寫信給阿睦爾撒納企圖謀求與西蒙古的聯合獨立，章嘉國師利用他喇嘛領袖的政治影響，平息事變，有利於清朝多民族的統一和鞏固。

比較修建雍和宮和製作佛像的經費可發現，前者的經費支出較後者多，這是雍和宮所藏佛像來自中外稀世珍品。雍和宮有清宮藏唐宋遼金元明的古代瑰寶；蒙藏康的貢品；西藏古佛像；清朝帝王在北京自造的佛像等。清宮有中正殿和造辦處專門成做佛像，因此由雍和宮製作的佛像機會也較低。

四、雍和宮喇嘛的活動

乾隆9年皇帝派遣親王充當雍和宮的行政首長，稱為「領雍和宮事務大臣」。乾隆17年（1752）制定雍和宮的官員額數：設郎中1員、員外郎1員、掌稿筆帖式1員、筆帖式2員、副內管領1員、兼行內管領1員。雍和宮喇嘛的餉銀和米糧，直屬於理藩院柔遠司管轄。⁴⁸ 喇嘛全都登記在三本冊子上。第一本叫「花名冊」，把全廟的喇嘛職銜、姓名、籍貫、年歲等都寫在冊子上。第二本叫「餉冊子」。第三冊叫「糧草冊子」，「米冊子」。理藩院查明後，批准行文戶部銀庫撥餉，由倉場發米豆，草場發稻草羊草等。⁴⁹

《大清會典事例》載，雍和宮建立四學，安設西番、蒙古、本京喇嘛共五百名。又設住持達喇嘛1人、德木齊4人，承辦廟內一切事宜。⁵⁰ 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建為擁有四個學院的大型喇嘛寺院，第一個學院「扎年阿克學殿」，學習曆書的學校，又稱「數學殿」，在永佑殿前的西配殿，又叫「扎寧阿殿」，乾隆時代此學院的喇嘛由摩覺夏仲擔任教師。喇嘛除了研習時輪天文曆算外，還要研習與修觀有關的時輪密乘。第二為「曼巴拉桑學殿」，又叫「醫學殿」，學習印度最深秘的醫術。位於永佑殿的東邊，又稱為「東學堂」，由彭措扎林擔任教師。此學院

47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19，頁7547-7548，乾隆21年8月下。有關章嘉國師協助清政府平息青滾雜卜叛變，另參見趙雲田，《章嘉和清朝的藏傳佛教政策》，頁34-45；昭捷，《嘯亭雜錄》，卷10，頁362-363。

48 關於雍和宮的人事資料，參見〈雍和宮聽差等年貌花名冊〉、〈雍和宮蘇拉等花名年貌清冊〉、〈雍和宮筆帖式達他等出身頂戴清冊〉、〈雍和宮堂司各官員筆帖式等銜名冊〉，A字號，第56捲、61捲。

49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71-72。

50 （清）李鴻章等奉敕撰修，《大清會典事例》，卷1173，頁18796-97。

的喇嘛主要研習《四部醫典》和《藥王月珍》、《晶珠本草》，還研修或舉行密宗儀式，如「藥師佛自入壇城和燒壇法會」、「馬頭金剛自入壇城和燒壇法會」、「阿佛閣入壇城和燒壇法會」。第三學院是「參呢特」或譯作「擦呢特」，漢文的顯教的「顯」字，專門研習顯乘經典的地方，此殿稱為「顯乘宗」，由哲蚌寺的哈東熱澤巴·阿旺曲培擔任。第四學院稱為「巨特巴學殿」或譯作「珠德巴拉桑」，就是漢文密宗的「密」字。「巨特巴學殿」在雍和宮正殿前的東配樓，又稱「溫度孫殿」，由日喀則色派密院的喇嘛官卻丹達擔任教師。⁵¹ 這些喇嘛的衣食經費是由內務府撥出。

（一）雍和宮的經費來源

乾隆年間，雍和宮喇嘛經費有專門的款項，奏銷檔與〈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檔案載，四學學藝喇嘛的衣食由生息銀兩或香燈地租支付。

乾隆9年12月和碩和親王等奏，雍和宮念經辦買供獻並喇嘛飯食，約計每年需用銀6,000兩，此項銀兩係由恩賞八旗及內三旗銀兩之利息支付。⁵² 乾隆15年（1780）皇帝將雍親王府所有的莊園改撥為雍和宮香燈地，共400餘頃，坐落二十七州縣。包括容城、定興、霸州、任邱、固安、遵化、灤州、懷柔、東安、雄縣、寶坻、蠡縣、密雲、良鄉、永清、涿州、新城、房山，易州、天興、宛平、通州、昌平、香河、順義、薊州、三河縣，每年額徵地租銀8,578.07兩、制錢1,240,148文。⁵³ 劉小萌研究北京旗人捨地論文提到，北京旗人經濟收入穩定，到寺觀趕會進香，施銀捨物，成為一種時尚。寺觀要表彰施主的慷慨解囊刻立石碑，從碑刻資料看出旗人大量捨地導致旗地流失。⁵⁴ 乾隆皇帝封賜雍和宮香燈地畝，或許帶動旗人捨地的風潮。

金梁的《雍和宮志略》說雍和宮是北京第一的大闊廟，每年准進地租白銀八千多兩，不只服裝和辦公費夠了，尚有餘款可以貼補喇嘛的生活費。實際上，雍

51 土觀·落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137；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92-106；朵藏加，〈藏傳佛教密宗與北京雍和宮〉，頁93-96。

52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14冊，乾隆10年11月11日。雍正元年給予八旗及內府三旗本銀10萬兩，共90萬兩。每年按一分利生息。

53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88冊，乾隆32年9月10日。自乾隆15年迄32年，新舊積欠至25,000餘兩之多。

54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捨地現象研究〉，頁36-47。

和宮的香燈地自乾隆35年以後陸續欠租。根據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奏摺稱，自乾隆35年至嘉慶25年各州縣欠銀20,249.01兩、制錢1,460,146文。又道光元年起至同治13年續欠銀108,908.04兩、制錢11,700,312文。故，自乾隆35年至同治13年共欠銀129,157.05兩、制錢13,160,458文。⁵⁵或許香燈地租欠銀太多，以致清末時內外蒙古王公必須每年支付喇嘛的衣食費。

根據《雍和宮志略》記載是向內外蒙古本旗的扎薩克王公索要，每年共交衣食費銀65兩，以80名計算共需銀5,300兩。⁵⁶《欽定總管內務府則例》記載，嘉慶18年奏准雍和宮喇嘛等飯食僧道口分等項銀兩錢文由本處香燈地租項下支領。⁵⁷而光緒年間頒布的《欽定理藩院則例》記載：「修改雍和宮四學考中名號班第及食二兩錢糧班第，由本旗扎薩克處每年每人給廚役銀十五兩，三年每人給衣服銀三十兩。學藝班第八十名，由本旗扎薩克處每年每人給口糧銀四十兩，廚役銀十五兩，三年每人給衣服銀三十兩。由各該扎薩課彙交該盟長處，年中作為一次派員呈送到京。」⁵⁸由此可見清末財政困難，雍和宮的學藝喇嘛等的飯食銀由蒙古的扎薩克王公支付。

（二）喇嘛的月餉

雍和宮喇嘛最高的首領是札薩克喇嘛，札薩克為清代官名，意為總管。喇嘛為札薩克者管轄僧眾。其次，是「蘇拉喇嘛」、「教習蘇拉喇嘛」、「額外教習蘇拉喇嘛」，這些喇嘛每月領錢糧和坐馬之草料和柴薪。蘇拉喇嘛以下分「德木齊」和「格斯貴」，這兩種喇嘛只領餉銀無坐馬。上述喇嘛的隨帶徒弟稱為「格隆」和「班第」，格隆每日給銀3分、米2.5升，班第每日給銀2.85分、米2.5升，又稱為「學藝喇嘛」或「學習喇嘛」，他們分為四級有「二兩喇嘛錢糧」、「一兩五錢喇嘛錢糧」、「九錢喇嘛錢糧」、「八錢喇嘛錢糧」。⁵⁹各級喇嘛的錢糧根據《理藩部則例》記載，雍和宮喇嘛額數以及月銀如表一所示：

55 〈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第1964包，光緒2年10月18日。

56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111-112。

57 （清）不著撰人，《欽定總管內務府則例》（一），頁1542-1543。

58 （清）不著撰人，《欽定理藩院則例》，卷60，頁4。

59 雍和宮四學設學藝喇嘛八十缺。每人月支錢糧二兩。此項額缺，咨取內札薩克六盟，每盟各十名。外札薩克四部落，每部落各五名，遇有本旗缺出坐補。參見《大清會典事例》，卷987，頁16957。

表一 雍和宮喇嘛額數與月銀

喇 嘛 名 稱	額 數	月 銀
札薩克喇嘛	1	銀4.3兩、米7.5斗、坐馬2匹、乳牛2頭、餵馬黑豆1.8石、穀草120束、羊草120束
蘇拉喇嘛	4	2兩、米7.5斗、坐馬1匹、餵馬黑豆6升、穀草30束、羊草30束
教習蘇拉喇嘛	6	2兩、米7.5斗、坐馬1匹、餵馬黑豆6升、穀草30束、羊草30束
額外教習蘇拉喇嘛	4	2兩、米7.5斗、坐馬1匹、餵馬黑豆6升、穀草30束、羊草30束
德木奇喇嘛	4	2兩、米7.5斗
二兩喇嘛錢糧	246	2兩、米7.5斗（包括格斯貴喇嘛2名）
一兩五錢喇嘛錢糧	254	1.5兩、米7.5斗
九錢喇嘛錢糧	120	0.9兩、米7.5斗
八錢喇嘛錢糧	80	0.8兩、米7.5斗

資料來源：《欽定理藩部則例》，卷56，頁16。

表一中所列的喇嘛人數共719人，又根據月摺檔記載乾隆11年賞雍和宮喇嘛的經費，喇嘛的人數只有以下章嘉胡土克圖等2人、札薩克喇嘛丹尊聖達爾等7人、大喇嘛祖爾濟瑪達爾濟等13人、副大喇嘛羅卜藏摩朗等44人、傅木齊羅卜藏札什等4人、喇嘛羅卜藏刻楚等522人、執事喇嘛80人，共672人。由此可知，喇嘛的人數不定，約在六、七百人左右。

喇嘛除了月餉收入之外，雍和宮為內蒙古地區信眾朝拜布施的聖地，喇嘛獲得王公等布施銀兩或捨地，收入可能更豐。如嘉慶2年，龔燦捨地給雍和宮陳喇嘛，共66畝作為香火地，每年交租京錢6,600文，由鑲白旗蒙古百壽代為取租。⁶⁰根據清代律例，喇嘛不准典買旗地，如施捨寺廟作為香火，立有碑碣或收租年分，准其管業。有關信徒捨地給喇嘛的問題，將來還須參考其他碑刻資料。

（三）賞賜喇嘛銀兩

1. 念經活動

中正殿和雍和宮念經處，每次念經的前三天，由中正殿發給雍和宮通知書，

⁶⁰ 〈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第1916包，道光17年12月10日。

名叫「傳牌」，又名「傳差」，又名「差經使」，或「經差」。雍和宮喇嘛在清宮和各御院內念經的「內課」職務。

金梁的《雍和宮志略》載，清帝即位後第一次到寺廟禮佛拈香，由內務府總管大臣奏請賞賜僧眾。這樣的特賞不過二、三十兩，在清朝只有六次。像雍和宮多達八百位喇嘛，均分特賞銀三十兩，每人至多只得到三分銀子。⁶¹此因清末宮廷財政困難所致，乾隆朝皇帝財力雄厚，常有賞賜。如乾隆10年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果毅公訥親等傳旨：賞雍和宮念經之大喇嘛1名銀10兩、喇嘛21名，每名銀5兩、此內烏木匠特2名、格斯貴3名，每名加賞銀3兩、喇嘛78名，每名銀1兩、此內格斯規1名加賞銀3兩、西藏喇嘛12名，每名加賞銀2兩、得木齊喇嘛4名、朝車特巴2名，每名銀4兩，共銀259兩。⁶²乾隆11年，和碩和親王等奏賞雍和宮念經喇嘛，共2,822兩。

上一小節提到乾隆帝分給雍和宮香燈地租，每年約一萬兩，然在月摺檔又額外編列雍和宮佛樓等處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每月約150兩左右。（參見表二）喇嘛誦經時喝小米和鮮牛奶煮的米茶，用黃油炸的糕點叫果子。法會中還使用大量的香、蠟燭，每次的費用都由內務府銀庫編列辦買香供的經費。

依照蔡玫芬所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起居注草本〉多次提到皇帝至寺廟拈香活動，但正式載入〈起居注〉的數量極少，說明清王朝的統御觀中，對帝王沈溺宗教活動有傳統史觀的忌諱。⁶³從〈月摺檔〉記載，乾隆皇帝賞賜喇嘛菜蔬銀，名稱分別為「香供銀」、「香燭銀」、「香燭菜蔬銀」、「素燭素供銀」、「菜蔬銀」、「道場飯食銀」、「齋供銀」、「素供銀」等，可見皇帝篤信藏傳佛教的事實。

在乾隆30年以後，皇帝和太后的萬壽節、歷朝皇帝誕辰、忌日的誦經活動都有賞賜各項菜蔬銀，雍和宮的誦經是在3月7至15日，此因康熙皇帝誕辰為3月18日，發給雍和宮的喇嘛和筆帖式400餘人菜蔬銀35.88兩，辦理念經活動。乾隆皇帝生日是8月13日、皇太后為11月25日，北京許多寺廟同時舉辦誦經活動，有嵩祝寺、法淵寺、宏仁寺、永安寺、闡福寺、慈寧宮佛堂等，皇帝特別賞賜菜蔬

61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124-125。

62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10年5月。

63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研究〉，頁31。

表二 雍和宮辦買香供與錢糧用銀

年 代	用 途	銀兩(兩)
乾隆8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8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465.75
乾隆10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0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725.07
乾隆11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1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895.31
乾隆13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3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777.25
乾隆14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4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793.46
乾隆15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5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830.97
乾隆16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6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138.54
乾隆17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7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975.85
乾隆18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8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453.07
乾隆19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19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819.56
乾隆20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20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531.61
乾隆21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21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640.19
乾隆22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22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675.06
乾隆23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23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681.97
乾隆24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24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864.55
乾隆25年	雍和宮佛樓等處乾隆25年分辦買香供等物，並給和尚道士等錢糧取銀	1,522.3

資料來源：〈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8年至25年。

銀。⁶⁴ 雍和宮的喇嘛必須支援各寺廟的誦經活動，譬如弘仁寺在乾隆33年以後，每年的8月1日至30日誦經的喇嘛、筆帖式共2,160人；11月1日至30日誦經喇嘛、筆帖式2,060人；12月26日起至28日念經三日，喇嘛、筆帖式人數210人；正月4日起至8日念經五日，喇嘛、筆帖式人數1,820人。這些寺廟舉辦誦經時，皇帝賜予柴米油鹽醬醋茶，還額外賞賜銀兩，喇嘛誦經時備受禮遇，相對之下，他們學習間的時間自然也減少許多。

⁶⁴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11年2月。（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94冊，乾隆34年8月20日。「如乾隆34年乾隆皇帝萬壽節，賞胡圖克圖1位，每位每日2兩，五日共銀10兩。坎布扎薩克達喇嘛、依爾喜達喇嘛、蘇拉喇嘛50位，每位每日1.15兩，五日共銀287.5兩。小喇嘛1,949眾，每眾每日0.15兩，五日共銀1,461.75兩。備辦萬壽道場、喇嘛飯食銀等，共領過銀3,042.27兩。慈寧宮念經喇嘛108名、筆帖式4名，三日共336名，每名應得銀8.62分，共銀28.978兩，每名應得細老米1.12升、麵8兩、鹽3錢、醋1兩、醬2兩、芽茶8錢、木柴5觔。」

表三 北京喇嘛寺廟的誦經日期

寺廟名稱	日期
雍和宮	3月7-15日
嵩祝寺、法淵寺	4月7-9日、8月1-30日、12月26-28日
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	4月8日
宏仁寺	1月4-8日、8月1-30日、11月1-30日、12月26-28日
永安寺	8月4-13日、11月21-30日、12月26-28日
闡福寺	8月4-13日、10月21-29日、11月21-30日、12月26-28日
福佑寺	11月1-21日
慈寧宮	11月3-23日
花園	1月3-9日、8月3-23日、12月5-25日
佛堂	8月4-13日

資料來源：〈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33年至35年

喇嘛辦理誦經時，內務府的蘇拉協助採買，均沾餘潤。內務府慎刑司檔案中有一案件是福兒向哥哥要錢，哥哥不給提出控訴。福兒供稱：「父親八斤原係中正殿蘇拉，辦理隆福寺、永福寺的供獻。弟兄四人，大哥八十四係幼丁，二哥八十六係蘇拉，三哥八十七亦係幼丁。父親病故，嘉慶十二年我跟八十六居住，八十四辦理供獻。十五年八十四病故，三哥八十七接辦供獻。我向八十七要幾吊錢做小生意，他不給。」八十七供稱：「我父親與大哥因與喇嘛熟識，幫他們照料，並非官差。」慎刑司官員的判決為：幫同喇嘛領取供獻，即少沾餘潤亦係勞力所得，並非弟兄應分之項。福兒依照卑幼告期親尊長律，杖一百。⁶⁵

2. 翻譯佛經

雍和宮的喇嘛翻譯佛經的工作，如乾隆33年（1768）8月至35年4月製作《甘珠爾經》，此經是藏文「教敕譯典」之意，相當於漢文大藏經的經藏和律藏。經文為貝葉式，製作精美，並於經板彩繪佛菩薩像，並以珍寶金花鑲飾，莊嚴殊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記載，《甘珠爾經》由札薩克喇嘛、賴喇嘛等抄寫金字，共抄寫經文108函，序文和目錄用藏、滿、蒙、漢四體文對照書寫。抄

⁶⁵ 〈內務府慎刑司呈稿〉，嘉刑第23包，嘉慶二十年四月。

寫金字《甘珠爾經》的喇嘛每人每月的飯食銀3兩，每月抄寫的人數不定，或只有十餘人，或多達百餘人，共用喇嘛飯食、工價，和筆墨紙張8,564.81兩。

乾隆37年（1772）為編譯滿文《大藏經》成立清字經館，由章嘉國師率領喇嘛和各部官員等96人，翻譯滿文藏經共2,525卷，雕經板共48,211塊，至59年完成。此經只印刷12部，費銀591,000餘兩。滿文《大藏經》分藏於各地藏傳佛教寺院，如北京宗鏡大昭之廟、雍和宮，承德殊像寺、普陀宗乘寺等。⁶⁶〈月摺檔〉中記載，清字經館每月給繙譯校對官、和尚喇嘛等飯食，並辦買紙筆等共領銀500兩左右。

（四）製作佛教供器

雍和宮跳布扎原是藏族傳統節慶，即避除不祥之意。喇嘛的頭戴面具，半呈黑白鬼。《聽雨叢談》記載：「布扎者，蒙古語也。年終集喇嘛於中正殿，建誦經道場，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樂跳舞，亦古人鄉儺之義。劉若愚《酌中志》略云，番經廠跳步叱，神廟時教宮女數人做法事，惟弓足者不能跳步叱，是明季已有此禮矣。布扎，即步叱，番語對音，無定字也。」⁶⁷跳布扎的喇嘛頭戴著特殊的頭套面具，身穿各色各樣的大袍，裝扮成各色各樣角色。喇嘛所吹奏的樂器為笙、管、笛、嗩吶、九音鑼、堂鼓等樂器。在月摺檔中有製作「嘎巴拉鼓」等器物，乾隆24年兼理總管六庫郎中事務侍讀學士寶善等奏，雍和宮等處跳步踏所用紅銅結子97分、噶布拉碗2分，鍍金用頭等赤金28.02兩、銀8.85兩。乾隆31年廣儲司總管六庫事務郎中常柱等奏，雍和宮等處跳步踏所用步踏衣上拴十字纓絡16分，焊做紅銅大小輪花等項，合對四六銀焊藥9.24兩，用銀5.54兩。領侍衛內大臣忠勇公傅恆等奏准，雍和宮等處跳步踏所用步踏衣上纓絡16分，每分大小紅銅輪花等項40件、小鐘57箇、鈴鐺24個，每一分鍍金用頭等赤金1.397兩，計16分共用頭等赤金22.35兩。⁶⁸

雍和宮喇嘛製作的供品是一種供器和鮮果的模型。供器的滿語叫「巴令」，蒙語叫「白楞」，即大塊茯苓的模型。鮮果模型是用麵捏成各種鮮果形狀，喇嘛

66 羅文華，〈滿文《大藏經》藏傳佛教繪畫〉，頁66-71；趙豔玲、于多珠，〈乾隆的滿族意識與清中央政權的凝聚力—從乾隆在承德的活動談起〉，頁37-41。

67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2，頁37。

68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24年11月；31年11月；32年6月。

稱麵鮮爲「麵供」。⁶⁹乾隆35年以後宮廷大量製作巴令，每月派喇嘛數十或數百人成做。喇嘛寺廟中使用巴令供佛，與清宮用新鮮瓜果祭祖不同。⁷⁰清代宮廷中正殿等處每月朔望供及供獻餽餽桌張用過盛京香水梨、曬山梨、英俄瓣、甜櫻桃、杏、甜桃、李子、沙果、蘋果、葡萄、柿子、文官果、石榴、核桃、栗子、黑棗、紅棗、榛子、白果、菱米、芡實等。⁷¹各項瓜果數以千計，每年約一萬兩銀。

清宮在每月的朔望日，中正殿舉行放烏卜藏和唸經的活動。每次放烏卜藏用鐵爐燃燒木炭、松柏枝、寶廠末等物，以消災祈福。《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載每月的朔望日，中正殿烏卜藏、唸經，用黑炭四斤、木柴四斤。放烏卜藏所需的香料、醫藥物品等亦由內務府銀庫支出（參見表四）

表四 雍和宮放烏卜藏之物品與價格

品 名	數 量	單價（兩）	用銀（兩）	備註年代
高 香	38.5 束	0.008	0.38	1751
黑 芸 香	0.27 兩	0.0031	0.0084	1751
白 芸 香	0.27 兩	0.0022	0.0059	1751
小 供 花	500 枝	0.001	0.5	1751
吉 祥 草	6 根	0.03	0.18	1751
飛 金	10 張	0.0025	0.025	1751
西 綠	4 兩	0.0375	0.15	1751
二 青	4 兩	0.2	0.8	1751
石 黃	4 兩	0.01	0.04	1751
羽 丹	4 兩	0.0125	0.05	1751
胭 脂	5 錢	0.005	0.025	1751
三 青	0.25 兩	0.0025	0.00625	1752
大 綠	0.25 兩	0.00075	0.00187	1752
彩 黃	0.25 兩	0.00025	0.000625	1752

資料來源：乾隆朝〈內務府銀庫進項月摺檔〉，乾隆16年10、11月；17年1月。

⁶⁹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54-55。

⁷⁰ 瓜果來自掌儀司管轄的果園，果園徵租的對象有兩種，在康熙年間園內舊丁每年徵銀三兩，新丁按地徵租每畝地徵銀三分，草二束折徵銀二分。參見（清）康熙朝《大清會典》，卷152，頁18。

⁷¹ 誦經與祭祀單位包括：奉先殿、壽皇殿、安佑宮、恩佑寺、恩慕寺、福佑寺、坤寧宮、御花園、中正殿、慈寧宮、佛堂、養心殿、英華殿等處供獻，再永佑廟、寧佑廟、內城隍廟、昭顯廟、凝和廟、宣仁廟、永慕寺、聖化寺、時應宮等寺廟。〈內務府題本〉，乾隆43年12月18日。總管內務府大臣永瑤題銷掌儀司收過果品錢糧數目事。

放烏卜藏有醫療物品，石黃分爲兩種，敲取石黃中深紅色，裡外均勻不暗者爲雌黃；色紫，顆粒粗，爲雄黃。⁷² 吉祥草在《本草綱目》記載：「生西域，胡人將來也。味甘，溫，無毒。主明目強記，補心力。」關於放烏卜藏的活動目前學者研究不多，將來還得需找資料說明。

日本學者長尾雅人提到具備四個學部的寺廟，是最典型的學問寺，而且規模龐大，需要大量的財力和物力。北京雍和宮四部俱全，但每個學部的學習活動少，內容也很平凡。⁷³ 雍和宮喇嘛支援北京各寺廟誦經、譯佛經、大量製作供器，誦經雖與修行相關，對於研讀經典和修習學問可能助益不大。關於雍和宮的學部課程必須找更多資料才能說明。

五、雍和宮與北京城市文化

清朝皇帝信仰藏傳佛教有長遠歷史，自皇太極時曾舉行大黑天的儀式，大黑天（Mahakala）是藏密的護法神。據說大黑天爲戰神，禮祀此神，可增威德，舉事能勝，西藏民間又視其爲司福之神。康熙皇帝以「無量壽佛」示現。乾隆皇帝則爲文殊菩薩的化身，他常穿上喇嘛朝衣，披著大紅綢的哈達，戴著金質五佛冠，或桃形黃帽，坐在戒台上靜坐參禪，或講經說法。皇帝表示：「佛就是他，他就是佛。」皇帝的佛裝像，除去幾個是照著寺廟中的菩薩、金剛等佛像面貌摹畫外，圍繞乾隆四周的人，據說大多數全是當時蒙藏各呼圖克圖，和札薩克達喇嘛以上諸人的真面目，畫這張圖的用意，是向蒙藏示顯他就是人間的「佛祖」。⁷⁴ 朝鮮使者參觀雍和宮時，見乾隆皇帝的肖像說：「乾隆像面目生動，峭直精悍。」⁷⁵ 乾隆皇帝佛裝爲何不是慈眉善目而是峭直精悍？或許爲了表現他當世間

⁷² 羅達尚主編，《新修晶珠本草》，頁84-85。

⁷³ 長尾雅人著、白音朝魯譯，《蒙古學問寺》，頁22-23。

⁷⁴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177；342-343。皇帝的佛裝像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結跏趺坐，手結說法印。上方爲釋迦牟尼佛、不動尊、根本上師宗喀巴等，表示一直傳下來到乾隆皇帝。其左爲普賢菩薩，右爲地藏菩薩。座下的藏文意爲乾隆是文殊菩薩的化身，是坐在金剛座上的人間之主、大德法王。畫面最下方是吉祥祐主、法王和吉祥天主三大護法。文殊菩薩爲藏傳佛八大菩薩之疑，稱爲「華嚴三聖」，爲毘盧遮那佛或釋迦的左右脅侍，是佛門中博學多聞、多才善辯、象徵智慧的菩薩。專司「智慧」，凡聞菩薩引入解脫門，皆文殊之力，諸菩薩中推爲眾首。1775年承德殊像寺落成，其實相閣裡的文殊菩薩像高11.6公尺，傳說是仿乾隆皇帝塑造。該寺有乾隆御製詩扁：「殊像亦非像，堂堂如是乎」。參見故宮博物院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頁209。

⁷⁵ 不著撰人，〈往還日記〉，《赴燕日記》，收入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下），頁848。

統治者的威望罷。乾隆佛裝唐卡目前存於世上有6、7幅，散見於瑞典、北京、瀋陽、布達拉宮等地。⁷⁶ 乾隆皇帝的陵寢藏有許多藏密的佛像浮雕、經文，可見乾隆皇帝信仰藏傳佛教非常虔誠，王公貴族亦深受影響。

（一）北京王公與喇嘛信仰

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建為藏傳佛教的寺院，對藏密在中國內地的傳播有特殊貢獻。《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載，乾隆皇帝學習佛法，年輕的皇子，宗室諸王、大小臣僚，漢族豪紳，以及皇妃身邊的太監等也隨之信奉佛教。章嘉國師通曉多種語言，他給不懂藏語的滿人、漢人和蒙古人分別使用他們的本族語言講經說法，流暢無礙。藏密素有「密無師承，不可濫學，未經灌頂，竊法無益」，章嘉國師為許多滿族人、漢人傳授「吉祥金剛怖畏十三尊灌頂法」，對上師和佛法產生了堅定的信仰。在漢地，身披黑色袈裟的僧人到處都有。一些和尚也得到密乘的無上灌頂和教誡，並進行體驗。在和尚寺院中，密乘教法也開始逐漸地傳播開來。⁷⁷ 《清代北京竹枝詞》載：「琳宮梵宇碧崢嶸，寶塔高高最上層，冬季啐經門外貼，相逢多少喇嘛僧」，可見北京藏傳佛寺和喇嘛之衆多。《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載，班禪於乾隆45年到熱河祝賀皇帝七十大壽，稱乾隆皇帝為「文殊大皇帝」，六皇子、八皇子、十一子等五子及七歲的公主向班禪獻哈達。班禪很高興為公主傳授灌頂。班禪到北京，為各寺廟喇嘛、執事、僧徒，大小官員等漢蒙信徒共千人摩頂。⁷⁸

《舊京瑣記》載：北京「富貴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為師，求其保護。」因而，「他處僧人即有冶游亦須秘密，都下僧人則公然行之，曾無愧色。」⁷⁹ 在朝鮮使者的「皇都雜詠」載：「喇嘛僧滿雍和宮，錦帽貂裘抗貴公。乾隆蓋是英雄主，賺得蒙蕃盡殼中。」⁸⁰ 在朝鮮使者的眼中，乾隆皇帝賞賜雍和宮喇嘛錦帽貂裘，並贏得蒙古、西藏藩屬歸附，儼如政教合一的「英雄主」。乾隆年間平定大小金川，將其投降者遷居香山。⁸¹ 41年清朝官員帶領金川

⁷⁶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259-261.

⁷⁷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186-187。

⁷⁸ 嘉木央·久麥旺波著、許得存、卓永強譯，《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頁473、488、513。

⁷⁹ (清)夏仁虎，《舊京瑣記》，頁42。

⁸⁰ 轉引自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頁163。

⁸¹ 關於北京香山的藏族研究參見張羽新，〈清代前期遷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頁33-37。

人到雍和宮拜佛，並瞻仰各處殿宇。其用意是讓他們在藏傳佛始祖宗喀巴面前，心悅誠服的歸順清朝。

漢人對藏傳佛教的看法則截然不同。陳康祺《郎潛紀聞》載，喇嘛一教，較浮屠、天方尤為誕罔。其人狡悍陰鷲，飲酒食肉，被服鮮麗，習技擊，娶婦女，無復戒律。黃教能畫符治病，唵經咒。紅教至能攝人生魂，睚眦之讎，咒詛立死。長年承應內廷者，至數十百人之。出則橫行街市，莫與誰何，縻帑惑民，於義無取。蓋本朝龍興之初，喇嘛效順最早，而其術盛行東土，又夙為蒙古諸部落所崇信，故優禮彼教，政以羈縻外藩。不虞相沿至今，祀典慶典，參預日多，駸駸乎欲淆秩宗之大禮，二百年來言事諸臣，惜無建議裁抑者。⁸² 陳康祺對喇嘛的觀感是狡悍陰鷲、飲酒食肉、被服鮮麗、橫行街市引發的反感。《燕京瑣記》載：「內城諸寺多改住喇嘛，而喇嘛之居窮奢極侈，踰於漢僧之蘭若。」⁸³ 清代理藩院對喇嘛禁令，有「藉端留婦女於寺廟者」，以及「喇嘛宿於無夫之婦人家，無論是否犯奸，喇嘛剝黃，鞭一百，令還俗」。⁸⁴ 是否徹底執行法令，或許還需找資料來印證。

漢人對喇嘛有些不滿其來有自，皇帝重視藏傳佛教，讓漢傳佛教的僧侶淪為章嘉國師的助手，使漢人心中頗為不平。昭槤《嘯亭雜錄》載，乾隆壬辰（1772），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其禪悟深邃，故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未譯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考取滿謄錄、纂修若干員繙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葺，然後四體經字始備焉。⁸⁵ 萬壽寺僧人蓮筏，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談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筏背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尚下乘學也。」⁸⁶ 況且，皇帝尊寵章嘉國師，其車直入東華門，令每到之處，人爭以手帕鋪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為有福。趙翼在《簞曝雜記》說「余嘗見章嘉，顏狀殊醜劣，行步需

82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1，頁7-8。

83 （清）闕名，《燕京瑣記》，頁124。參見（清）松森等撰，〈喇嘛事例〉，收入《欽定理藩部則例》，卷56，頁1-17。

84 （清）松森等撰，〈喇嘛事例〉，收入《欽定理藩部則例》，卷59，頁3、7。

85 （清）昭槤，《嘯亭雜錄·續錄》，卷1，頁385。

86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9，頁274。

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⁸⁷趙翼說章嘉國師容顏醜劣，班禪佛被稱為「癍疹佛」，因他出痘而示寂。看起來漢人士大夫對喇嘛似乎沒有認同與尊崇。

朝鮮的使者對喇嘛的描述為，「喇嘛僧眼深而睛黃」、「雍和宮後堂有僧徒數百聚食唸誦，其聲不類盡是蒙古僧，所食即羊羹雜以寬片粉，各吞一小木鉢。其服色極怪（怪）不可形狀。」⁸⁸雍和宮的喇嘛不盡是蒙古僧，是因喇嘛待遇優渥，不免有漢人濫竽充數。〈內務府來文〉刑罰類有一案例是胡福兒係順天府固安縣人，本生父姓劉，週歲時經胡鄺氏抱養為子。十四歲時胡鄺氏因胡福兒不成器將他攆出。乾隆53年冬，頂充正黃旗漢軍胡慶佐領下三兒名字，挑充萬壽山喇嘛名叫阿旺桑濟，因與喇嘛口角勒令還俗。又頂充正黃旗包衣管領二格名字，挑了香山喇嘛，名叫根丕兒。⁸⁹前述，雍和宮喇嘛接受信眾捨地中有陳喇嘛者，或許也是漢人充當喇嘛。

（二）雍和宮的廟會活動

北京每逢年節喜慶舉辦盛大廟會，雍和宮廟會活動人煙幅輳、車馬喧闐。《燕京歲時記》載：「打鬼本西域佛法，並非怪異，即古者九門觀儺之遺風，亦所以攘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諸天神將以驅逐邪魔，都人觀者甚眾，有萬家空巷之風。打鬼日期，黃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宮在三十日。」⁹⁰旗人子弟書提到「黑寺、雍和宮把打鬼的哨，為的是跑車去發標。」⁹¹雍和宮打鬼是在每年正月三十日至二月初一日，蒙古人稱打鬼為跳布札，「布札」為蒙古語「舞蹈」的音譯。藏傳佛教祭神舞蹈稱為「金剛驅魔神舞」更為貼切。跳布札是在法輪殿宗喀巴像前，廣陳供養，燃燈數百盞，供桌上放滿「巴令」。雍和宮跳布札後一群喇嘛結成隊伍，奏著樂器走出雍和宮，在街市上遊行名叫

87 (清)趙翼，《簞曝雜記》，卷1，頁16-17。

88 不著撰人，〈往還日記〉，《赴燕日記》，收入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下），頁848。

89 56年2月因不會唸經被革退，勒令還俗。胡福兒無處安身，往各處討乞度日，因行竊被獲。〈內務府來文〉刑罰類，第2164，乾隆58年11月29日。

90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頁49。

91 《庫丁嘆抄本》。

送崇，送崇的時候，抬著一頂黃轎將雍和宮小模型的邁達拉佛像，走在隊伍前面。⁹²最後是放烏卜藏，就是將各種珍奇寶物等放在火焰中燃燒。

雍和宮的跳布札吸引民衆圍觀，街道堵塞，附近的街巷商販雲集，形成著名的廟會。北京著名的廟會還有位於東城大市街西北的隆福寺，每逢九、十日有廟市，百貨駢闐，爲諸市之冠。西四牌樓北的大隆善護國寺亦爲北京重要廟會所在地，兩個寺廟皆爲藏傳佛教寺廟，販售商品爲旗人日用所需。旗人說唱子弟書描述逛雍和宮、護國寺、黃寺、闡福寺等，廟會活動多采多姿，商品琳琅滿目。⁹³乾隆年間廟會由宗教禮佛活動轉爲市集貿易，北京市民趁著趕廟會採購日常生活用品，兼觀賞各種百戲雜耍，促進了商業發展與文化活動。

雍和宮每年的12月初8日熬臘八粥給熬粥銀。《燕京歲時記》載：「雍和宮喇嘛於初八日夜內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監視，以昭誠敬。其粥鍋之大，可容數石米。」⁹⁴雍和宮至今保存一口高約1.5米，直徑2米的大銅鍋，就是當年爲皇宮熬臘八粥用的。據說咸豐朝以前每年要熬五鍋粥，第一鍋供佛，第二鍋送進宮裡，第三鍋分給王公大臣和廟裡的大喇嘛，第四鍋分給文武百官，第五鍋供衆喇嘛食用並捨給廟外的平民。⁹⁵

此外，雍和宮還有熬茶，是皇帝用來供佛，及施捨各喇嘛。熬茶將牛奶熬沸，加上一包四兩的黃茶葉、鹽一斤，快熟時加二錢乳油。乾隆46年定（1781）熬茶的牛奶價格，一等牛奶每桶價8兩、二等牛奶每桶價7.23兩、三等牛奶每桶價4.43兩、四等牛奶每桶價3.33兩、五等牛奶每桶價3.36兩、六等牛奶每桶價2.43兩，每桶牛奶重35.8兩。

（三）北京市民與藏傳佛教

由於乾隆皇帝大量修建藏傳佛教寺廟，且提供喇嘛錢糧，遂使宮廷所用的供器流傳於民間，北京市民對藏香、藏燭、麵供等都耳熟能詳。北京於元明清時代即爲藏傳佛教興教之地，藏香、藏燭、麵供等名稱卻在乾隆年間以後廣爲流行。

⁹²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頁349；（清）潘榮陞云：「前以鼓吹導引，眾番僧執曲鍾柄鼓，鳴鑼吹角，演念經文，遶寺周匝，迎祥驅祟。」，參見氏著，《帝京歲時紀勝》，頁8-9。

⁹³ 相關的資料，參見《清蒙古車王府藏戲曲本》，以及黃寬重等主編；湯蔓媛編輯，《俗文學叢刊》。

⁹⁴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頁93。

⁹⁵ 徐威，〈佛教節日與老北京民俗〉，頁25-26。

雍和宮所用的香稱為「藏香」，為北京市民常用的供香。《燕京歲時記》載：「所謂藏香，乃西藏所製。其味濃厚，得沉檀芸降之全。每屆歲除，府第朱門，焚之徹夜，檐牙屋角，觸鼻芬芳，貞香中之富貴者也。」⁹⁶此謂藏香為西藏地區所製。

然而，多數的資料顯示藏香產於廣東、雲貴、四川等地。在《粵東省例新纂》編列解送內務府的香和蠟燭的運輸費，即水腳、飯食銀兩。⁹⁷《老北京的民俗行業》載：「藏香，香為紫黑色，用花紅線纏之，以代包裝。供藏傳佛教修密者用。」藏香較名貴的是檀香，產於廣東、雲南等省，用於香料、藥料。還有名貴的芸香、紫降香。大部分從南省進料，自行加工而成。⁹⁸《長楚齋隨筆》記載藏香並非西藏所製，「內廷所用之藏香，如河工、安瀾、祭泰山、郊廟等事，均用藏香，例由四川總督進入，亦非真西藏所製。由成都購真藏香，再添香藥等料製成，始以入貢。」⁹⁹

又，雍和宮喇嘛所有的蠟燭，稱為藏蠟，是用水蠟樹上的蠟蟲分泌的蠟黏，以水煮溶過濾成白蠟，產於四川、貴州等省。白蠟由四川經西康輸入西藏，製作成蠟燭，顏色分大紅、金黃、雪白、金花等四種：形式有圓柱、方柱、六角、八楞。香與蠟皆產於四川。《紅樓夢》記載惜春寫《心經》時點藏香。由於清代藏傳佛教盛行，而有藏香和藏蠟的名稱，並成為北京市民常用的供品。

其次，北京市民家家供奉家堂佛，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消災延壽藥師佛、阿彌陀佛等三世佛，一般都用紙像，有的用陶瓷、銅鑄等。請佛像後，必須「裝臟」和「開光」，「裝臟」習俗似乎也受藏傳佛教影響。裝臟儀式是擇一黃道吉日，請五位和尚在神佛前持咒誦經，並以硃筆如法如儀地在神佛像點眼開光。通常在開壇前，先由放正領懺的大和尚用硃筆在黃紙寫「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放在銅佛像的腹內，表示「裝臟」。如果是紙像，由大和尚將六字真言往神佛背後一貼，就算裝了臟。¹⁰⁰

96 (清)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頁97。

97 岩井茂樹，《中國近世財政史的研究》，頁49。

98 常人春，《老北京的民俗行業》，頁17。

99 (清) 劉聲木，《長楚齋隨筆三筆》，卷2，頁520。

100 同註98，頁247-248。

雍和宮喇嘛做巴令就是大塊茯苓的模型，有朵雲、山形或靈芝狀，其原料據〈月摺檔〉記載，做巴令用大綠1觔14兩、胭脂4兩5錢、石黃9兩、廣靛花4兩5錢、黃飛金30張、城6觔。¹⁰¹內務府作供花用白麵捏成各種鮮果形狀，喇嘛稱麵鮮為「麵供」，也成為北京市民禮佛和祭祖的供品。《老北京的民俗行業》載，春節期間奉獻給神佛、祖先的麵鮮「成堂麵鮮」，以香油白麵為皮，白糖、冰糖渣、桃仁、青紅絲為餡，烤製成各種不同水果型的點心，並稍點以顏色，使之美觀。每堂為五碗，每碗六斤，共重三十斤。通常為桃子形、蘋果形、橘子形、柿子形、佛手形（或石榴形）各一碗，每碗五個。此外，北京還有「成堂蜜供」，蜜供用油和的半發麵，切成長約一寸左右，厚寬俱為三四分的小麵條，油炸後滾上蜜，疊落起來。一般家用和商號的多為方形、圓形的寶塔形狀，頂端像個小金字塔，其高度不一。花樣上分為卍字供、十字供等。宮廷、王府或敕建大廟用卍字供。¹⁰²蜜供是否也由麵供演變而來，仍需考證。

六、結 論

乾隆皇帝在雍和宮的〈喇嘛說〉碑文提及：「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又乾隆58年（1793）頒佈《欽定西藏善後章程》，上諭，於雍和宮設金奔巴瓶，飭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薩克喇嘛等，公同掣蒙古所出之呼畢勒罕。所謂「呼畢勒罕」是達賴、班禪和其他呼圖克圖圓寂後，轉世靈童。¹⁰³乾隆解釋興黃教諸多措施，其用意在維繫多民族的統一。

然而，從乾隆皇帝贊助雍和宮的經費可看出他大力推廣藏傳佛教，他在位六十年間修建雍和宮和造作佛像的經費超過三十萬兩。其次，乾隆皇帝捐獻四萬畝做為雍和宮香燈地，每年收入約一萬兩左右。再加上各種賞賜等，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間，林林總總的經費支出不下餘百萬兩。以致有朝鮮使者描述「喇嘛僧滿雍和宮，錦帽貂裘抗貴公。」喇嘛獲得皇帝大力支助，顯出一片榮華富貴景象。透過雍和宮的建制，成為藏傳佛教的信仰中心，乾隆皇帝自身也成為蒙古、西藏的宗教領袖，達到政教合一的統治目的。

101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39年4月。

102 常人春，《老北京的民俗行業》，頁318-319。

103 趙爾巽，《清史稿》，卷15，頁555。

雍和宮的喇嘛報答施主，在皇帝和皇太后生日前後，各喇嘛寺廟持續幾日的誦經活動。到乾隆五十年左右，北京的藏傳佛教寺廟每月都舉行誦經活動，此是否為皇帝延年益壽不得而知，但帶動北京信奉藏傳佛教的風氣為不爭事實。

北京達官貴人爭相信奉藏傳佛教，連喪葬都找雍和宮喇嘛作法會。有趣的是，漢人卻對藏傳佛教抱持負面的看法，與蒙滿藏人虔心的態度截然不同。下層民衆則因藏傳佛教在北京普及，將祭祀所用的香通稱為「藏香」。雍和宮喇嘛所有的蠟燭，稱為藏蠟，亦成為北京市民常用的供品。雍和宮的跳神、放烏卜藏吸引許多民衆觀賞，因而在寺廟周圍商販雲集，成為北京重要的廟會。再者，北京市民家家供奉家堂佛，請佛像後，舉行「裝臟」儀式，和尚用硃筆在黃紙寫「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放在銅佛像的腹內，此習俗似乎也受藏傳佛教影響。雍和宮喇嘛用麵捏成各種鮮果形狀，滿語稱為「巴令」，後來這樣的「麵供」，成為北京市民禮佛和祭祖的供品。

本文僅利用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和〈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的檔案，看到雍和宮的修繕、造佛像等經費支出，對於喇嘛的宗教活動描述不足，期望將來有機會利用其他資料來補充。不過，作為藏傳佛教代表的雍和宮，皇帝慷慨地花上百萬銀兩，說明他不遺餘力推廣宗教活動。本文僅對雍和宮做初步探討，未來擬繼續討論北京、熱河、東西陵、多倫諾爾等地區的藏傳寺廟，目的在於呈現十八世紀中國帝王的宗教活動和消費文化。

附錄 乾隆修建雍和宮工程用銀

時 間	工 程 項 目	銀 兩 (兩)
乾隆13年7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奏准雍和宮工程處辦買物料領銀	30,000
乾隆13年12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奏准雍和宮工程處辦買物料併給匠夫工價先領過銀三萬兩今又領銀	20,000
乾隆14年4-7月	雍和宮成造佛33尊，併做五塔龕等項取銀	20,000
乾隆15年1月	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准雍和宮萬福閣成造佛像併乾清門等處工程辦買物料，併給匠夫工價領銀	銀86,038.54兩、赤金315.07兩
乾隆15年6月	雍和宮萬福閣前添建東西配樓2座，並西邊修建廟宇成砌墻垣修理暗溝等項工程，實用銀兩	16,937.36
乾隆17年4月	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准修理雍和宮喇嘛住房廿九間領銀	803.45
乾隆17年7月	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准粘修雍和宮殿宇僧房併東書院殿宇房間辦買物料，併給匠夫工價領銀	2,864.19
乾隆20年2月	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准雍和宮東書院五福堂改安碧紗廚三槽闌福壽閣下添供掛像佛廿三軸、永安寺山後西邊平臺上建立鑄造銅仙人成做早白玉石八方須彌座等項辦買物料，併給匠夫工價領銀	615.6
乾隆25年3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粘補修理雍和宮後佛樓數字房間辦買物料，給匠夫等工價領銀	2,832.90
乾隆27年12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粘補修理雍和宮東書院殿宇房間，併後佛樓房間以及雍和宮廟宇鐘鼓樓旗杆等項工程辦買物料，併匠夫等工價領銀	16,619.53
乾隆29年1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奉旨雍和宮萬福閣上層添設懸山踏踏龕四座、大西天琉璃閣下簷隔斷板墻開券門二座、大殿添安供桌三張、佛座十一分、掛簫杆三根、雕龍簫頭十八箇，仁壽寺無量壽佛殿內方亭帶子板彩畫佛像勾描泥金，弘仁寺添安早白玉石爐座一分等項工程辦買物料，併給匠夫等工價領銀	1,114.81
乾隆29年12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粘補修理雍和宮等處工程辦買物料，併給匠夫等工價領銀	16,619.53
乾隆31年1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修理雍和宮東書院後佛樓等處殿宇房間，並拆修法輪殿脊上琉璃塔座找補畫廊、油飾等項工程辦買物料，併給匠夫等工價領銀	15,223.53
乾隆32年11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粘修雍和宮殿宇圍房找領不敷銀	549.99
乾隆35年9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准粘修雍和宮牌樓等項領工料銀	2,900.45
乾隆38年11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奏銷修理雍和宮三面牌樓等項工程銀	3,625.56

時 間	工 程 項 目	銀 兩 (兩)
乾隆44年8月	郎中福大文開奏准修理雍和宮、西黃寺等處三座安裝牆院，並收拾甬路散水等工，領原估工料銀	944.16
乾隆44年9月	七日員外郎連城文開奏准修理雍和宮法輪殿西邊添建重簷戒臺一座，辦買物料工價，共領銀	10,099.94
乾隆44年12月	廿五日員外郎連城文開奏准改建雍和宮法輪殿西邊重簷戒臺一座、添蓋遊廊佛像等工，領續估工料銀	985.01
乾隆45年2月	員外郎連城文開奏准改建雍和宮、法輪殿、東邊藥師壇、照西邊戒臺殿樣式、上簷、添週圍廊、內簷裝修等工程銀	8,286.8
乾隆47年4月	郎中連城文開奏准雍和宮、法輪殿、西邊戒臺殿改建重簷戒臺殿一座，又改建藥師殿等項工程銀	23,172.03
乾隆50年12月	二十七日郎中十格文開奏准粘修雍和宮牌樓三座、天王殿前旗杆二根、柵欄三十一槽等項工程，估需物料工價銀	3,570.65
乾隆51年5月	郎中十格等文開奏准粘修雍和宮牌樓等工辦買木植磚瓦匠夫工價銀	2,111.67
乾隆59年2月	郎中六十八等文開雍和宮大殿前丹陛上建蓋重簷亭安立石幢工程，共估需工料銀	13,631.71
乾隆60年10月	郎中阿克當阿等文開雍和宮大殿前丹陛上建蓋重簷亭安立石幢工程，奏准實銷工料銀	13,281.07

資料來源：乾隆朝〈內務府銀庫進項月摺檔〉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內務府來文〉刑罰類、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內務府題本〉、〈內務府慎刑司呈稿〉，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雍和宮聽差等年貌花名冊〉、〈雍和宮蘇拉等花名年貌清冊〉、〈雍和宮筆帖式達他等出身頂戴清冊〉、〈雍和宮堂司各官員筆帖式等銜名冊〉，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1987。

《庫丁嘆抄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蒙古車王府藏戲曲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2000。

（清）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經》，臺北：臺灣印經處，1956。

（清）不著撰人，《欽定總管內務府則例》，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

（清）不著撰人，《欽定理藩院則例》（光緒34年刊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 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三編72輯，1993。

（清）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下），肅蘭市：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2。

（清）李鴻章等奉敕撰修，《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清）昭槤，《嘯亭雜錄》，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清）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清）夏仁虎，《舊京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清）黃寬重等主編；湯蔓媛編輯，《俗文學叢刊》，臺北市：新文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趙爾巽，《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77。

（清）趙翼，《簞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劉聲木，《葺楚齋隨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臺北：進學書局，1969。

（清）闕名，《燕京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二、近代論著

土觀·落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朵藏加，〈藏傳佛教密宗與北京雍和宮〉，《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2期，頁93-96。

金梁編纂、牛力耕校訂，《雍和宮志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長尾雅人著、白音朝魯譯，《蒙古學問寺》，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故宮博物院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少卻知足”、“一切皆空”及“莊嚴具足”：中國佛教的物質觀〉，收入胡素馨主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頁35-47。

徐威，〈佛教節日與老北京民俗〉，《中國宗教》，2005年2期，頁25-26。

常人春，《老北京的民俗行業》，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張羽新，〈清代前期遷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西藏研究》，1985年1期，頁33-37。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黃春和，〈元明清北京宮廷的藏傳佛教造像藝術風格及特徵〉，《法音》，2001年1期，頁31-36。

雍和宮佛像寶典編委會編，《雍和宮秘藏》、《雍和宮佛像寶典》、《雍和宮唐喀瑰寶》（上、下）、《雍和宮建築藝術》、《雍和宮織繡精品》、《雍和宮法物法器大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嘉木央·久麥旺波著、許得存、卓永強譯，《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趙雲田，〈章嘉和清朝的藏傳佛教政策〉，《西藏研究》，1987年2期，頁34-45。

趙豔玲、于多珠，〈乾隆的滿族意識與清中央政權的凝聚力——從乾隆在承德的活動談起〉，《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4年1期，頁37-41。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捨地現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1期，頁36-47。

德勒格，《內蒙古喇嘛教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羅文華，〈滿文《大藏經》藏傳佛教繪畫〉，《中國書畫》，2004年3期，頁66-71。

羅達尙主編，《新修晶珠本草》，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42號，2003年，頁127-238。

岩井茂樹，《中國近世財政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社，2004。

Kahn, Harold (康無爲), 〈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 收入《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 1993, 頁57-72。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